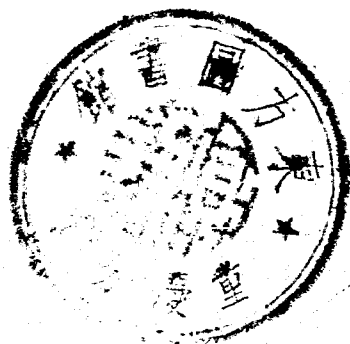


抗戰建國小叢書

潘公展 葉溯中 楊公達 主編

英國外交與遠東和平

孫煦存 編著



七二

獨立出版社印行

英國外交與遠東和平

目次

前言

第一章 英國外交之基礎

一	英國民族性	1
二	英國民意與外交	5
三	自治領之制度	7
四	政治機構與外交	11
五	商業與地理之關係	14
六	他國之影響	17



3 2285 0403 5

M6
D856-12
27

第二章 英國外交之基本政策

一 橫變的本質

二 所謂「不干涉主義」

三 所謂「光榮孤立」

四 國際均勢

五 其他

第三章 英國外交與遠東局勢

一 英國遠東外交之回顧

二 九一八以來英國外交錯誤之背景

三 西門外交之後果

四 英國遠東政策之前瞻

緒論

前言

英國人最不願寫作，日常生活動以及一切政治設施，可算完全以習慣爲依歸，習慣法（Common Law）在英國勢力之大，真是非可想像。外交文牘，則更趨趨無幾，非萬不得已，絕不輕易出手，遇有交涉，率半以口頭談判爲主；此不獨英國政府與他國政府間之往還爲然，即該政府與其駐外使節，亦復如斯，絕無書牘調示，爲開辦之例。以之反觀，則其在維也納任內，所敷政牘之四斗信匣中，有二十九函未得復，此處爾羅斯必當（Lord Malborough）亦云當歸之於海牙、馬德里、柏林、聖彼得堡時「從未一獲植香之來文」；如此，則英美人之寫牘中，直接探悉英國外交之真實面目，豈非緣木求魚？然其因難之深，自不難想見一較。

英國外交以策，雖「一般學者所云，是「某項有（Non-existence）」，然其外交，亦絕非毫無依據，金靈爾（C. W. Clegg）說：「如鬼一般的虛無縹緲，乃英國外交之唯一特質，英國從未有，且將永不會有一比較長久清晰與肯定之政策，所有者，只是一些指導原則，有意無意間影響英政府對於某事件所採取之行動而已」。此種指導原則如何？其基礎何在？所影響於遠東和平存如何？值此英國外交復行活躍，與夫各方對之輿論紛紜之際，吾人豈不覺不倍覺加著。

第一章 英國外交之基礎

一 英國民族性

維加畢羅(Von Bülow)所言：「外交家應有不同的特殊皮膚，時厚如象皮，能負巨重而不動，時薄如含羞草，一經接觸，立即聚合」。緊弛并用，剛柔並至，此之所謂外交技術，技術愈高妙，外交愈靈活，收效愈宏大。然一國國民性之影響外交，實遠在此技術之上；就外交官本身而言，個人本性，實具有絕大之影響力，在在影響交涉之過程；個性剛強之與個性文弱，固屬有異；個性直率之與個性圓滑，復亦不用。至就整個國家而言，則全民族之民族性，多足左右一國外交，此不特對於某某事件所運用之策略爲然，即基本原則之確定，亦多與之有關。英國民族性納於言，多含蓄，好惡鮮表示，「當其他孩童之面，親吻子女，以英人視之，爲最不可原宥之狂妄行爲」；不親疏，不使他人難堪，一則博愛大同，一則避免因嫉怨而生仇恨。嘗有人表示英人實際好助，不虛僞求譽，實言一英人旅行，枯坐火車中，藉閱泰晤士報以遮面，不與同座交談，然當同座無力

將所舉行拳舉置座上擲物處時，彼忽擲報幫忙，待畢，未及他人道謝，彼已復取報紙遞回，不一他視。巴多(Racques Erdoux)於敘述萊翁斯大使(Lord Lyons)時云：「將其政治聰明，孤獨心境，宗教真誠，等等祕密，一起帶去墓中，彼之羞怯特質，實所罕見，彼曾整週不出花園，深恐穿過階台時，而受其新門房之致敬」。此種不願受謝，避免致敬，而遇急幫忙，乃英人之通性；致所謂「羞怯特質」，亦只於此處見之，苟遇政見不同，立場各異，彼等將無任何羞怯可言，關係愈深，爭論愈烈，也可以說因爭論而彼此愈知愈深，致關係與感情愈益增進。

Fair Play 二字，在英國極爲普遍，不特處處聽道講，且可到處看見做，一切須誠直公平。從事運動遊戲時，自己當然要精練、機敏、勇敢、有阻礙、有把握，目的在克制對方，戰勝對方，但於此項目的之外，對於運動規則，尤須竭誠遵守，不好滑、不欺詐、不予對方以惡意的打擊，與未任何陰險的處置，此就積極進攻對方而言；此外尚須給對方以表現能力之機會，否則縱得獲勝，亦意存僥倖，非到地紳士之所願爲。至若於對方已被克制之後，肆意驕淫，竭盡「打死老龍」之能事，非路人所齒，更爲英人所唾罵。包爾溫於其「關於英國」一文中曾云：「英人於內心，於行動，均爲世界上最和藹之民族，英國對可憐的已敗之人

(Underdog) 有「一種極深刻的同情」。如此，不特不「打死老虎」，并且以同情援助，絕不因其已「居下風」，而施以欺凌或輕視。

此外，國體的，苟被人克服或傷害，絕不另圖報復，不論其方法如何，斷不一作此想，惟待以寬宏原宥，傷害愈甚，原宥愈深，依賀布 (Hobbes) 「此乃自信自任之表見」。馬克那斯 (F. S. Mackenzie) 認爲「英人之高貴特質，使其不能如其他民族一樣，多結仇怨，或厲行報復，辟斯道 (Pisot) 雖誓言其攫取四辨士，唯爲報復，實則并非如此，英人極少以戰爭爲自傲，然其以忍受怨恨而自豪，乃屬慣見之事」。英人之不究已往，而能忍尤爲特質，就過去歷史，從好的方面說，以英人之能忍，實避免了不少戰爭，戰爭之後，以英人之不究已往，誠亦再生不少國際協誼，歐戰結束，牛津大學教職員寄語德奧同事有云：「爲消滅因愛國主義而於吾人間所生之酸苦仇怨，在吾人意志相同，與感一致之場合，吾人之競爭，吾人之野心，在在均有調協之可能，至吾人對學術智能之共同愛好，只要吾人之精神與理想不滅，深信其必將引導吾姊妹民族至較大同情較好和協之康莊大道」。如此，四年血戰，驟成陳跡，以同情代仇怨，以攜手代擄殺，戰後英政府對德態度之所以和緩，不僅妥協，且顯暗助，雖有他因，但此種不記仇怨

之普遍心理與民性，未始非推動該項政策之主要原因。

英倫三島的地形，時常被一般政治哲學家比爲一大海船，政府自由掌舵，不受任何約束，在大洋中水天一色，無錨碇繩纜以及其他一切牽掛；艾姆生（R. W. Emerson）於其英人特性中即云：「英倫像一海船，天然自由，任何海軍大將不能使之改變或停泊於較優良較有效果之地位」；英人之好自由，不喜約束，於此可見一斑。

馬達銳加教授（Prof. Madriaga）說：「法人信賴思考，每每不信賴生命，常求以將來的生命，禁錮於現在的思考之中，英人則信任生命，而不信任思考，所以不求預觀未來，而滿足於過橋過橋，無橋可過，便涉水渡河，預先確不考慮」。英人主現實，不重思考，思考所得，未必即與現實相吻合，與其曰費思考，無庸唯求現實，且預加思考，每每預存成見，致帶顏色眼鏡，而將未來之現實改觀，遠不若錯在大洋，遇風即風，遇雨即雨，欲束則束，欲西則西之真實與自由；至無路可通，彼等亦絕不妄加思考，置撞壁於不顧；「無橋可通，便涉水渡河」，一方面主重現實，一方面顯示勇敢與果決；無路不借撞壁，無橋不畏涉水，不惜犧牲，不白犧牲，一切取決於感覺（Tact），而不列置於思想（Thought）。

變定之後，立即見諸行動，英民族之所以有今日，或即肇基於此。

二 英國民意與外交

一九一六年冬歐戰方酣，薛西爾（Cecil）於答復下院外交質問時，縱橫有「政府不能與下院及任何人分其責任」之言；論者多以其謂政府責任重大，外交一切，不特應保守秘密，免事未成而機先露，且有全權獨斷獨行，俾不致人多嘴雜，時間遷延，效率削減，而政府不能盡其厥職；實質未盡如此，一國外交之得失，關係全民族全國家之得失甚至存亡，政府爲人民代表，人民公僕，雖決無禍國殃民之存心，致故意行使喪權辱國之外交，但各人之主觀，與夫對某某特種事件之觀察不同，政府官員所見，或正與人民所見相反，而其所見，且或正趨於喪權辱國，所謂「當局者迷」，并非絕不可能。其次，雖政府人員之智識能力經驗，較一般人民爲高，其所見所解，自亦較普通人民爲遠爲深，但國際事件之演變，并非絕依常理，光怪陸離，每每出諸當事者意料之外，此種演變，或正與政府人員之主見相違背，而與普通人民之觀察相吻合，亦在意中。復次，政府人員之所見，縱極準確精明，且必與未來之事實演進相符合，但如普通人民對此之了

解未足，致對當局發生誤會，此種事實，於人民之教育程度較低之國家，尤屬屢見不鮮，即以英國而論，前外相霍爾（Mr. Hoare），其學問能力見地，在在均多足稱，阿比西尼亞事件之初，與法總理兼外長拉伐爾（Laval）成立協定，將阿國分割，以滿足義國慾望，此種措置，以事後事實觀之，或不得謂為不智，乃義人之征服全阿，雖云其具有預定計劃，但事後演變，實多少帶有 *l'appetit vient en mangeant* 之概，是故有人說，霍爾拉伐爾之計劃，如果實現，阿比西尼亞或不至有如今日之命運，但此種計劃，因不得英法人民之了解與同情，不特成爲流產，且霍爾拉伐爾均皆因此下台，民意尤其是英國民意之不可忽視，豈薛西爾「政府不能與下院及任何人分其責任」的弦外之音所可想見。

實則薛氏之言，或另有所謂，蓋外交誠有若干事件，須保守秘密，政府且須保有相對的自由行動。即果如上述的一般人士所推論，則薛氏政見，早已大加變遷，英倫甚至全世界愛好和平人士之輿情，現已由薛氏領導，如火如荼，督促政府，監視政府，以抵抗侵略，以伸張正義。於其最近論及國聯時，彼復有曰：「國聯乃各民族（Nations）之聯合，經由政府，Nations當然發言；但其理想，並非爲一舊式概念；如維也納會議時一樣，全權大臣相聚一堂，決定彼等所有觀

爲公正者，決定以後，再續請其全民族按照施行，此種程序業已過去，今者苟欲得國際調協，於該獲各政府本身之信服外，且須取得爲各該政府後盾之民衆的信服，欲其如此，則端賴公開宣傳，俾各民族不特有機知某某事件之結果，并亦親見其到達該結果之歷程，……無此公開宣傳，將難得各民族之支持，揆言之，公衆——國際輿論即無行動，無此行動，任何國際組織幾不可能。準是，民意之與外交，之與國際關係密切，自不難想像。英國爲民治且爲代議制之母，對內對外，民意之重量極大，政府有時雖顯其具有全權，力行所是，然直接間接受民意之影響者頗多；一念之差，根本與民意背道而馳者，固無法施行；即本不與民族利益相違，但輿論未成熟，不予以支持者，亦難有效，英義協定簽訂半年後，張伯倫始敢提付國會者，即前此之輿論未達成熟之時也。特觀察輿論之重心，吾人須從多方着眼，部份的、少數的輿論，雖亦足影響英政府之行動，然其重力究渺乎其小，吾人自不能盲人摸象，致無法探求英政府之真實態度。

三 自治領之態度

國際關係日益繁密，不特英國本部與英帝國全體的關係，難解難分，即整頓

世界，業已連成一環，牽一髮動全身，斷難爾爲爾我爲我。英國外交，每每與整個帝國有關，因之對外一切，不論其事關英國本部或帝國全體，在在均受各自治領國之左右；在此情況之下，荷英國本部與英帝國的意向原即完全一致，無相對相互牽制之可言，自然力量龐大；可是事有未必，因地理商業以及其他種種利益的關係，彼此間時不一致，邇來荷果如一般論者所謂英國外交軟弱無能，則其所以如此，帝國間之意向不一，當爲主要原因之一。

就近數十年的史實以及現時之情況觀之英國本部與各自治領國，早已各自形成一種傾向，實質已不止是一種傾向，一九二八年麥唐納即說：「英國雖是世界帝國，然而畢竟是歐洲國家」，此其意，即英國須對歐洲事件，特別加意，亦即說各自治領國之散佈於歐洲之外，其事件，在英國視之，將列入於歐洲事件之後。當然，英國本部與歐洲僅有二十一哩之多弗海峽相隔，在過去，已曾重感歐洲威脅，現時交通發達，海陸空尤其是空航之猛進，戰事發生，倫敦有於十二小時內有成焦土之可能，如此，自不能不有「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之安全，是不能與我們的安全分離」，以及「英國邊界在萊茵河」等等的感覺與表示；因爲此種地理關係，同時再加上軍事實力關係，英國一則不能不側重歐洲，二則當保全英帝

國之繼續存在，不能不鼓勵各自治領國從事自衛，分担維持和平及保護帝國公共安全之責，因為苟期以英國本部單獨之軍力，來維護整個帝國安全，事實上已顯示其不可能。至在各自治領國方面：以地理關係，環境、民性、生活、甚至文化政治等等各有不同，天然集團，各自分離，由單純的殖民地，進而為自治領國，名稱雖與其他獨立國家有異，實質幾盡相同，其所對於此，當為必然之演進，而非僅單純人事有以造成，一九二六年之帝國會議，認彼等為「英帝國中之自治單位，效忠於同一王室，自由加入不列顛群島國（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地位平等，不論在對內或對外，絕無任何附庸之可言」。一九三一年的威斯敏斯特組織法（The Statute of Westminster）更將其正式訂成法律，但各自治領國尤其是幾個大的如加拿大澳洲等國之流，并非自此法案之後，始各自獨立和自治，實則如勒非教授（Prof. Leif Johansen）云，彼等「在法律上未成國家之先，事實上早已與其他國家一樣」。對內自主，對外獨立，派遣使節，出席會議，簽訂條約，在與諸獨立國家并無二致，如此，自治領國之於國際間，一切各有自由，其外交并不絕對受唐甯街之編譯或轉移，梭瓦特教授（Prof. Soward）近曾有言曰：「民治國家近難遭遇危殆，最在自治領國所承受教育之現時代的人

們，以先進自治爲自豪，決不願改變其原有政策」，意即自治領國寶貴自治自由，不願與英國及其他民治國家同一行動，致被捲入漩渦；國聯成立之初，加拿大即對盟約第十六條不滿，上院議員且久郎德（Senator Dandurand）在日內瓦曾說：「在這個互相保險的防火會裏，各國所承擔之危險應各不同，吾加拿大人生活於天然的防火室內，距離易於燃燒之物甚遠，一大洋將吾等與歐洲分開」，其不願與歐洲國家同一行動，至爲明顯，英本國既爲歐洲國家，彼等自亦不願置自身之利益於不顧，而徹底的與英合作。

若是，英國既以歐洲爲重，各自治領又以自身爲重，則兩者各以獨立自主之原則，見解自多不合。於日內瓦及其他國際會議中，加拿大有時不特不支持英國，且與其主張相反。但在另一方面，一則英帝國之所以存在，完全因各個單位相互有利，有此必要，尤其關於經濟方面，是故「英帝國以功利主義而存在」。二則因普遍的派遣使節，所費至鉅，各自治領過去無此設備，現亦不願多此一舉，對內團結，對外一致，於英帝國公共利益，自易保全，因之於國際間，英國猶歷代表整個帝國，一九二六年之帝國會議即「斷然承認於外交於自衛，其主要責任，現在固由英政府担負，將來於相當時期內亦仍如此」；英政府於負担此項責任之

際，由於上述種種原因，自須顧及各自治領國之利益，徵求彼等之意見，因而受彼等之牽制不少；且也國際連環性日盛一日，英帝國爲大國際中之小國際，各單位間之關係密切，自益強盛，其牽一髮而動全身之慮，自必更多，故雖僅云與英國本部有關之事件，但擴而充之，實亦與整個帝國有關，如此，英國外交可算處處須顧及自治領國之意見，受彼等之左右。據自治領大臣麥唐納於去年十一月一日在下院報告，去年十月三十一日以前，英政府關於外交問題與自治領磋商發往自治領之電報，達三百九十八通；僅九月一月中，因捷克問題嚴重，竟一百五十通；這種實母怪乎哥不萊（H. M. Collet）於論英國外交時說：「謀事在英倫，成事在自治領國」，自治領之態度於英國外交之決斷性，其重量可知。

四 政治機構與外交

自民主政治抬頭，代議制度勃興以來，對外交，英王卽徒有虛名，不特無獨斷獨行之可能，一切且不能左右絲毫；弗羅沙（Frothingham）早說過「英王實祇從其臣民，爲臣民之所欲爲」，現在雖臣民之所欲爲，彼亦不得爲，一切實權，完全操之於國會、內閣，而尤其是首相之手。英國國會體制之母，所謂會議，顯

名思想，完全側重於討論、辯論，所有重要問題，須經國會討論之後，舉行表決，獲得多數，方可付諸施行，就原則，內政外交均應如此，實則事有未然，關於內政方面，英國國會對政府之監督力極大，於外交則稍有遜色；其影響政府之外交途徑，約略如下：（一）國會可直接向政府提出質問，對於某某事件，求得圓滿解答；（二）遇有重大事件，下院每舉行公會議論，有關閣員，類多參與，議員對政府外交之得失，可盡情指責，政府亦竭盡辯護之能事，此與前項質問相似，然性質則遠較嚴重；（三）政府僑觀察議員態度如何，每值外交顯有轉變之際，輒提出信任案，政府苟果置國會之意志於不顧，國會對之即不信任，閣潮即隨之而生；（四）反對黨對政府某項外交事件不滿時，可提出譴責案，斥責政府所行與國會意志不符，此項譴責案，雖極少通過，然對政府之政策既有集體的不滿表示，政府自亦不能漠然置之；（五）有時國際協定，亦提付國會通過批准，然後再付諸施行，英義協定即此例之一；（六）國會可利用普通立法權，間接約束政府，如有關修改關稅，或增加負擔之協定，簽訂之後，須國會通過法案，俾條約藉得以履行，此時國會如對政府所行之外交政策不滿，即可拒絕通過法案，以示反對，凡此種種，均為國會於有形之影響政府之外交者。此外議員尚

可推動甚至製造輿論，議員各有選區選民，彼等因代表各該選區與選民之利益而產生，產生之後，其與各該選區與選民取得密切聯繫，自屬必然，因之當與選民書札往還，或親赴選區演講，選民以信仰彼等而選舉之，故彼等所言多得選民之渴誠接受，如此，彼等如對政府之某某外交政策，有所不滿，彼等自可從旁推動輿論，以增加政府進行該項外交政策之阻力。

內閣由下院多數黨所組成，對國會負責，首相則多爲該多數黨之黨魁，英國內政的一切施政方針，大權固完全操之於彼等之手，卽於外交，亦復如斯，所有政策策略，均由彼等取決，是故內閣首相如有更易，外交亦必隨之而發生影響，因各黨派之政見不同，外交政策亦多差異；卽以內政方面，政見之相互懸殊，外交行動因而遭受影響者，亦復不少，就過去史實，於裁軍會議、於海關會議、英國見解時有不同，其所以如此者，要爲內閣更易，先後內閣所屬黨派不同所致；於同樣情況之下，日內瓦議定書（Protocol of Geneva）始因而成立，終因而流產；至十數年來英國對俄態度之反覆無常，尤爲此狀態之顯著證例，勞易喬治、故麥克唐納、及故韓得森等所行者，故張伯倫、包爾溫、則反之；現之所謂國民兩閣，名義上雖由各黨聯合組成，實則爲各保守分子之大聯合。大權操之於保守

黨，故其外交自與勞工黨等有所不同。至首相則更大權獨攬，其個人意志，每多轉移一切，尼維爾張伯倫此次活躍於歐洲，其所行所爲，多具主見成見，於慕尼黑會議中，承允分割捷克，以及承受担保捷克新疆界之新義務，固未曾事先取得國會同意，其對義談判，尤顯獨斷獨行，非特多數閣員，即外相本人，事先且未得獲預聞，準是，首相之影響外交，其重量自不難想像得之。

五 商業與地理之關係

拿破崙說，英國是個「開罐子的民族」(Nation de bouquiens)，專靠買賣，否則無以爲生；三島彈丸之地，一切工業原料，多半取自他處，而製成之工業品，三島復無法收容，端賴向外推銷。因其具有此種商業背景，所以自亞丹斯密斯(Adam Smith)以至密爾(F. S. Mill)，「出產自由」與「貿易自由」，均爲其立論之出發點，此種立論，影響於英國經濟政策至鉅，出產自由，各種工業，得因公開競爭而發達；工業發達，於是產量增加，產量增加，遂設法向外推銷，但各國因所謂主權關係，各有制度，不特貿易不能如意所欲，甚且遭受拒絕或牽制，爲解除此種困難，唯有「貿易自由」，在此原則與政策之下，貨物可達

出無阻，至少不致遭受絕對的拒絕，此種經濟與商業政策，已多足影響一國外交，何況英國商業特別繁盛，貨物遍全球，「英國製」字樣，充斥各地，如此利益重大，固為世界之冠，且係其國民命脈所繫，畢特（Birt）所謂「英國外交政策即英國商業」，當然具有至理。英國名義上雖說是因德國破壞比國中立，而參加大戰，實實為自衛，為恐懼德國奪其霸權，使其商業，戰事結束以後，德國則弱，此種恐懼消散，英國人士又從另一方面，但仍着眼於商業利益，而力主扶德，費休（Fisher）說：「歐戰以前，德國為英國最富有最宜適之市場之一，許多工業品，如蘭克夏的棉織物，西費爾的鋼鐵，要以德國為對象，北部幾個工業城，甚至以德國為生」；不僅此也，德國於本身消受英國貨物之外，且代轉輸至中歐東歐，因之非力勃傑不斯（Sir Philip Gibbs）更進一步說：「德國失敗，歐洲商業之主要輪軸，亦隨之停滯於途，一切牽延甚至摧殘於泥潭之中，除非此重大之車輛重行行動於中歐大道之中，英國將無法恢復其商業地位」；德國於英國商業重要若此，所以歐戰以後，英人多主扶德，其中固有他因，但商業與政策不分，實英國外交特質之最顯著者。

三者不可分離，英國為此三者，經長時期之努力，且曾從事不少戰爭，至十

九世紀末葉，始得殖民地遍全球，利益瀰漫，所謂「七大海中無落日」，東南西北，不論任何角落裏，都有英國重大利益存在，如此，英國爲維護帝國利益，保持帝國安全，其責任範圍，自不僅在歐洲而已，是故討論英國外交政策時，普通均注意下列三點：

(一) 卽所謂弗蘭特新路線 (Flinders Line)，經柏納邦 (Bernard) 萊茵河而至北海，在此範圍之內，英國絕不願見任何強國稱雄，十八世紀中，曾一再阻止法國之進侵，於比國獨立之初，以及其後，英國所採取之態度，亦仍着眼於斯；一八七〇年英國之所以坐視法國遭受重大打擊者，實因一八六六年普法秘密談判，以及法國北侵企圖之被披露；至一九〇四年英法之所以愈趨親睦，亦緣一九〇三年德國動員計劃中有侵比之意向，而此項計劃，被英國情報處所秘密獲得也。

(二) 爲海洋路線，經直布羅陀、馬爾泰、波斯否爾斯、蘇彝士、丹吉爾、好望角、亞丁、新加坡、香港、曼爾堡，圍繞全球一週，在在均係英國認爲所謂「生命線」，因此有人說：「英國外交政策也就是海洋政策」。

(三) 印度路線，印度於英帝國中地位重要，人盡知之，大部份外交取決，每多預爲關懷，此處所謂印度路線，與前者海洋路線無關，意卽由陸路經敘利亞、波斯灣而去印度也，英人對此路線，極爲重視，在拿破崙時代也好，在克利米戰爭

時期也好，在巴爾幹戰爭時期也好，不任何時，英國對此，從未一變視線，從上而國地理、亦即因政治經濟軍事等關係而生之三種路線觀之，牽一髮動全身，英國外交非若其他各國之單純也可知。

六 他國之影響

國際間存有連續性，一國外交甚至內政，時時受其他國家之影響，英國爲世界最大帝國，殖民地遍全球，利益彌漫，其與其他各國之聯繫，自亦遠在任何國家之上，英美同文，同爲民主國家，且同爲盎格魯撒克遜族，雖遠隔大洋，然關係密切，互相影響，尤其關於外交方面，通力合作，則收效宏大，苟專事推諉，或牽制，則步步維艱，一事無成，如此英國外交受美國態度之影響，固值得特別申述，同時亦可概括其他。

一九一八年初，威爾遜總統宣佈其「十四條」(Fourteen Points)，其第十四條即云：「須於密切盟約之下，組織一普遍的國際聯盟，各國互相担保其政治獨立土地完整」，嗣後國聯之成立，即多肇基於此，然威氏雖竭盡精力，從事於和平不可分割之偉大運動，和約成立，國聯誕生，威氏理想終未能一一實現，但

強強人潛之處，自亦不少，尤其是關於國際連鎖性方性，可是此之所謂成就，美國會一一加以否決，彼等追懷華盛頓臨別贈言，以及所謂門羅主義，力主美國退出歐洲事件漩渦之外，自此所有國際組織，尤其是關於政治方面的，美國均拒不參加，處處顯示消極的不合作，此種態度，使英國每感孤掌難鳴，從而有形無形間直接間接的，牽制英屬行動，使其顧首顧尾，如此情形，於英美之間，每帶相互性，就是說：英國態度遲疑，亦時使美國裹足不前，然客觀的說，英之於美，終不若美之於英，爲重大爲繁夥。

英美消極的不合作，固已影響英國外交行動，於此消極的不合作之外，尙有積極的爭鬥存在於彼等之間，歐戰四年，英國所受損失重大，同時復欠美國戰債四、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故戰後經濟勢力，自遠在美國之下，戰前倫敦爲世界金融中心，戰後紐約取而代之，戰前英鎊爲國際匯兌之標準，戰後則一落千丈，而美元勢力則日盛一日，戰前英國海外投資最多，戰後美國在各處之投資，或且過之。至英國之戰債，非至一九八四年不能償清，如此戰後英國之金融資本，在在受美國之壓迫，其感不安，因而設法推倒美國之優越地位，自在意中。奧斯丁張伯倫時之英美外交，其基礎，多設立於此，及至世界經濟恐慌之第

二年，即一九三一年，英國復召集第一次帝國經濟會議，樹立大英集團經濟之基礎，次年又於渥太華召開第二次會議，奠定英鎊集團之基礎，至一九三五年之世界經濟會議時，大英集團經濟於焉完成，是具有集團機構而與美集團經濟相鬥爭。

英國素以海上皇后自尊，海軍以標榜兩強標準政策（Two Powers Standard Policy）其於海上之威權，決不容他人攬奪，詎知於華盛頓會議時，美國竟有英海軍平等之提出，因之，華盛頓會議後，兩國利益愈益不能調和，競爭遂亦日趨劇烈，一九二七年爲欲和緩兩者間之緊張情況起見，特邀請日本於日內瓦開三角會議，不意所謂海縮會議，直變爲軍擴會議，爭持不下，終至面紅耳熱，毫無結果；自此以後，英國見情勢急轉，無可挽回，故從另一方面着手，藉圖對抗，因此，於歐洲則與法聯絡，於遠東則竟有英日同盟復活之提出，以冀牽制美國，此種態度，直至九一八事變時，迄未變更，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美政府公佈其所致中日覺書後，英政府不特不作同樣表示，且宣稱：「英國政府之政策在擁護滿洲境內九國公約所保障之門戶開放政策原則，關於此點，日政府既已屢次表示加以遵守，故英國政府認爲無致送同樣覺書之必要」。史汀生建議合作，引用九國

公約，于累日以制裁，西門則始終漠然置之。

於經濟政治等不和之外，心理差異，當亦爲加深不和之動力，「戰後美國之退出歐洲與國聯，繼之以英政府對史汀生於日人進侵滿洲時所出建議之態度，大削減英美兩國於外交上切實合作之機會」，其所以如此，雙方均不容稍辭其咎，尤其在心理方面，美國的心理，如賀畏（H. W. Hornell）所云：「美國之所以退出歐洲，保守孤立，并非是如一般人所稱因地理環境關係，實乃一次吃苦兩次羞怯（Once bitten twice shy），美國人已吃了英國不少虧，參加大戰，完全是受英人之欺騙所致，一之已甚，豈可再乎，現在故不與之合作，并對之嚴加提防，免再受其利用。於此種疑懼心理之下，「英人希望美人爲他盡責」，遂致風行一時。至在英國，自有極多數人主張與美國合作，但費爾得好斯教授（Prof. H. N. Fieldhouse）將美人對英政府之態度分析而得四種，從此四種態度之分析，亦可反映出英人對美之心理如何。其第一種：即一部分天生的對英國懷疑與爲難者，於阿比西尼亞事件，彼等一方面斥責英國未曾盡力支持國聯，另一方面則說英國之所以支持國聯，純爲其帝國主義之自私計劃；第二種：即許多主張孤立主義者，根本不願與任何國家合作；第三：爲許多自由黨，彼等完全爲北美一種壞

習慣之反映，即慫恿他人冒險，自己則不願問問；第四：爲許多消息靈通地位智識較高之人，被等深知英國爲美國第一道防線，英國如失去一等強國之地位，美國亦必因而遭受損害，如此，彼等認爲英國如至最危急，幾近傾覆之際，美國勢非適而相助不可；但英人以爲美國援助之可以挽救歐洲者，斷爲立時之援助，俾戰事早日結束，否則戰事遷延，美入躊躇來遲，英國雖終得最後勝利，然經濟組織破產，一切損失不貲，此種因美國之遲遲援助致戰事遷延而得之最後勝利，其痛苦將較無美國之援助而立即失敗者爲尤甚，英人自多不願。於此互疑以至互嫉心理之下，兩國外交又焉能不受惡劣影響，近數年來，雙方尤其是英國常喊出外交之調整（*Adjustment*），艾登遊美，商約簽訂，於歐洲混戰，遠東火拚，兩者態度亦漸趨一致，其所以如此，當即此項調整工作有以致之。

第二章 英國外交之基本政策

一 機變的本質

於明瞭英國外交之基礎，即知道其外交政策之從何以及爲何而來之後，吾人

對該項政策之本身，勢不能不略加述及，然於申述英外交基本政策之先，復有一點，吾人絕不能稍加忽視者，即奧斯丁張伯倫曾說過：「吾人竭力避免普遍化，且對極端邏輯之結論表示懷疑，乃就事實，邏輯於吾人之日常生活中，實佔極小地位，吾人受習慣、愛情、預測、智覺、以及臨時感動等等之指示，遇有重大問題，極少受哲學家或史學家之鋼性邏輯所引導。因彼等工作於和平靜肅之圖書館中，而與人類日常生活之複雜與擾攘情況相距太遠也」。如此，因為需要與人類日常生活之複雜與擾攘情況相吻合，所以避免普遍化，到什麼山，砍什麼柴，決不預為堅執，英國人自己說，他們對任何重大事件，向未預有籌劃，對大戰也好，對英王退位也好，對獨裁者擴大侵略也好，他們從無預備，也從想不到預備，因為「彈性於任何政策中，為必不可少之要件，吾人若不確知一事之將如何產生與發展，而竟籌劃於先，是不智之尤」。既這樣，英國外交實無若何剛性的基本政策之可言，至為明顯；所以吾人之所欲言者，亦祇是如「前言」中所云，從過去史實中，尋求一些英國外交上之「指導原則」而已。

二 所謂「不干涉主義」

一八一八年之麥克斯拉夏派爾 (Aix-la-Chapelle) 會議，決定從法國撤兵，并承認法國立於相等地位，致造成所謂五國同盟 (Quintuple Alliance)，但在另一方面，「神聖同盟 (Holy Alliance) 之透明精靈，確亦因之而得「有機軀體」」。嗣後西班牙、拿波爾、葡萄牙、比利時、希臘、土耳其等國之繁亂，多受列強之干預。一八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俄奧普的屈羅披議定書 (Trojan Protocol)，更明訂「一國政府如因革命而遭受變遷，結果威脅其他國家者，該國將終止爲歐洲同盟盟員之一，非至合法與穩固秩序能至担保情況時，不得恢復其盟員資格，……荷此種改變，予其他國家以迫急威脅時，同盟國議定，將從事和平方式，或遇有必要時，從事武力，以將此犯罪國家回置於大同盟懷抱之中」。英國對此干涉政策 (Policy of Intervention)，曾屢表反對；卡斯特勒夫 (Castlereagh) 堅決「否認一國因不同意他國政府之變更，而具率加干涉之權」。但是英國此種不干涉 (Non-Intervention) 政策，亦非絕對具有不變之鋼性，愛及瓦 (W. Edwards) 於其英國外交政策一書中，即直言：「荷英國利益遭遇危害時，雖不干涉原則亦必放棄」；克林 (Canning) 於葡萄牙、希臘等處固屢顯干涉實跡，巴爾馬斯登 (Palmerston) 的「整飭歐洲」的口號，以及其對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土爾其等

等措置，亦俱與所謂不干涉相距頗遠；誠然，於俄國之干涉東歐，法國之進展西歐，奧普之擴張於東南歐，英國曾屢表反對，有時以反對無效，而實行所謂反干涉（Counter-intervention），但此種因干涉而干涉，其出發點雖有不同，然干涉則一，因之，英人之所謂不干涉，或因干涉而干涉，俱誠如法人所云：「是一種形而上的政治名辭，其實質與干涉二字絕無二致」。

三 所謂「光榮孤立」

時而不干涉時而不干涉，固已顯示英國有意形成「不列顛的統治」以 *Mis* Britannia 或「不列顛的和平」*Pax Britannica*，使兩歐甚至全球均以英倫之馬首是瞻，英國除虛偽的不干涉政策外，更有所謂光榮的孤立（*Splendid Isolation*）一八七〇年七月十四日，法國對普魯士宣戰之際，深期其克里米戰爭中之盟友，能力加援手，然事有出其意料之外，英國不特不加援手，且嚴守中立，對作戰區域加以限制，并阻止法人之謀獲奧援，待戰事結束，法國賠款，雖以英國之說項，而得稍減，但阿羅兩省，仍於威力之下遭受分割，英國之光榮孤立，論者多謂自此開始。實則所謂孤立，其意義就一英國作者所解釋，為「英國於 *Concert*

Orbigny 之中，保持主要位置，但不與任何國訂立同盟；以求獲得自由，且與一八八二年德奧義所成立之三國同盟，及一八九二年法俄所成立之兩國協商相連離」。而奧斯坦張伯倫則云：「英國歷史上也曾有力求不預，或不倚賴大陸上的事件的時期。但是每次都爲時不久，且這種隔絕的政策，不論是否「光榮」，結果總不良好，天然的形勢，使我們的本島過於接近歐洲海岸，以致大陸上每有風潮爆發，我們總不能不受其影響，而交通的發達；及科學發明的進展，却增加了我國的易損性」。此與前者相對照，則英國的所謂孤立，完全爲保持超然，不願預受任何約束，免一旦事變發生，而妨害其行動自由，所謂光榮孤立，論者多謂自格蘭得斯登 (Gravelstone) 開始，的斯萊李 (Disraeli) 沙李斯必萊 (Salisbury) 等繼之，其實彼等從未孤立，且認「英國外交政策，乃英國內政事件中之外務部份」，并聲聲不離「維護大英帝國」；因之，對巴爾幹、對埃及、對南美，在在均顯猛進姿態；俄土戰爭之後，俄勢漸侵巴爾幹，英國國會立即通過龐大軍火費用，意者不惜戰爭，在英人視之，或爲欲孤立而未能，其實英國容或以此內政關係對外欠積極，然其所以如此者，要亦爲保持超然不受約束；此種態度，於歐戰以後，表示得益加明顯，英國力圖立於各種糾紛之外，尤其是亟願立於各

種糾紛之上，不願爲「當事人」，而極謀爲「調停者」「仲裁者」，日內瓦議定書之流產，因英國不願受任何約束所致，歐戰時英國爲反德聯合陣線之一，凡爾塞和約創造人之一，可是嗣後因該和約而發生的各種爭端，英國多視若與己無關，在在以調停人自居，即此次因西班牙內戰所產生之干涉西亂委員會，英國亦力避牽入漩渦，身爲民治國家，且力謀推廣民治政治；但不願與其他民治國家成立陣線，以與諸極權國家相對抗，處處保全自由行動。

四 國際均勢

所謂干涉所謂孤立均係避免約束，保持超然行動之別名，此種態度，於英國外交極具重要性，至所謂國際均勢 (Balance of Power)，於英國外交之重要，則尤顯之；此種政策於一七二三年之厄特諾特 (Utrecht) 條約中，即已見之，其後逐漸成長，直至近世紀，可算成爲英國外交政策之中流砥柱，英國殖地，則全賴利益關係，不論何處發生變亂，英國均有牽一髮而動全身之感，是故，則如奧國和奧國和各方紛擾，見乃爲英國最高利益，如其不然，則一國可乘機乘

中盡大權力，以危害他國之自由，因而有損英國商業」。拿破崙權力極盛之時，卑視一切，危害全歐，英國多方聯絡普奧，嚴防法國勢力伸張；及至拿破崙失敗，威勢大減，於愛克斯拉夏派爾會議中，英國即從事扶法，力主聯軍從法國撤退，并承認法國與四國同盟，立於平等地位，致形成所謂五國同盟；其後因俄奧等正統政策，有危害歐洲均勢之可能，故竭力設法阻止；及至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五日，普士麥將法大使班賴夕錫（Benedetti）親筆所寫法國屬意於盧森堡與比利時之草約披露時，英國大示不滿，認法國爲「罪惡重深」（Deep Guiltiness）不特於戰時未能如法國所願望，助以攻德，且於戰事結束以後，對阿羅兩省之分割，雖多爲英倫輿論所不滿，然英政府確未見對德施以若何壓力，於此英政府一念之差，致德帝國蒸蒸日上，而國際均勢，遂因之遭受鋪控，威爾遜總統曾云：

「關於阿羅事件普魯士所給予法國之錯誤舉動，延長世界不安近五十年之久」，此種錯誤舉動，於其說來自普魯士，無庸說來自英國，此種錯誤，英人亦明知之，故自一八一七年以後，德意志帝國統一，國勢日振，英國遂轉而聯法，誠然英國曾屢求與德相互提攜，但德之欲與英國同盟，而遭「英國不願將火中栗子，取給德人」之回答，因爲事實；至英國與法則多方聯絡，且於一九〇四年四月成

立「友善協商」(Entente Cordiale)，此後英國極力支持法國，德皇一再要窺法國非洲摩洛哥，均受英人之反對而未遂行所欲，一九〇六年一月集會於阿爾及爾(Algiers)之國際會議，「其結果實爲重認一九〇四年之協商，英法之關係因而愈趨緊密，其所以如此者，英國於外交上給予法人之支持甚大」。迨至一九一四年秋，德國侵犯比國中立，英國參戰助法，戰爭結果，德皇室崩潰，草命發生，凡爾塞和約將德束縛重重，弱彈不得，法國則國勢日振，不可一世，致歐陸均勢，復失平衡，英對於此，遂轉而扶德抑法，賠款問題、萊茵問題、擴軍併奧、增防亡捷、存在不特將凡爾塞體系破壞無遺，且歐陸均勢，益復因而不能，如此，英國爲維護均勢國策，其對德國將有所措置，自屬必然。

至對遠東，英國政策亦復如此，中國向主閉關，鴉片戰爭後，被迫而開放門戶，致英國之海洋政策，與俄國之大陸政策，互相爭雄於我國境內，政治經濟在在受此兩勢力之影響；克里米戰爭後，俄爲英法所敗，英法於遠東亦見調協，一八六〇年有英法聯軍攻陷平津之舉；其後英法以暹羅問題失和，俄法因此得而接近，卒於一八九二年締結具體同盟，自此俄國南侵之勢益顯，相形之下，英國遠之勢既孤，其另覓奧國，以圖對抗，實屬必然。其始也，英人猶以中華古國，地

大物博，潛伏力量當必可觀，因之，頗有拉攏以圖對抗俄法之意，奈彼時當局失明，以聯英與親俄政策不符，致拒絕英人同盟之要求，一念之差，鑄成大錯，緣自甲午一役，中國弱點暴露無遺，英國遂轉而聯絡日本，唐紹儀氏於一九二〇年夏對美記者談話曾云：「在中日戰爭之前，英國由其駐北京公使麥唐納氏，向中國建議，并要求中國與英國成立一種諒解，中國當時頗忌俄國，北京政府不願成立任何諒解同盟，其後中日戰爭發生，英國密切注意何國將成爲較好的同盟者，願以勝利者爲同盟，而日本得勝，麥唐納立即由北京轉到東京使館，其結果是英日同盟」。此同盟締結之後，中日關係益益懸殊，日人之所以有今日之橫行無忌，不顧一切，實源於此。當然英人目的彼時完全爲對俄，及日俄戰後，俄國敗北，遠東地位削弱，同時德國遠東政策漸趨積極，大足以危害均勢，與夫英人利益，英人於此不得不設法以制之，因之第二次英日同盟續訂時，遂改以德國爲對象；歐戰將終，德國遠東利益完全落於日人之手，日本且乘機侵略中國，銳進不已，日苟稱霸，自與均勢政策不符，英日同盟遂不得不瓦解，而以九國公約與四強公約代之，一九一八事變以後，均勢破壞，日人之企圖獨霸，愈益顯明，致造成華古未有之變亂，此後和平，惟賴日人侵略野心之消滅，從而均勢之復原，至爲

五 其他

廣泛言之，英國外交之基本政策，當不僅此，波斯拜議員（Boothby）於英國外交政策一文中列舉英國外交政策爲：（一）法國比利時及荷蘭如遭受未挑釁之襲擊時，英國則出力以助；（二）維護地中海之航行自由；（三）防止日本之侵略行動超越赤道以南；（四）與美國聯合，保持海上霸權；然深刻一些說，雖此四者，亦僅維護現狀，保持均勢之真意所在，英國爲飽滿國家，利益遍天下，不論在任何場所，亟願維持和平，免遭損害，雖艾登縱否認英政府於任何代價之下而求和平（Peace at any Price），簡單言之，英國外交政策爲和平，方法爲均勢，目的爲維護利益，與保持領袖地位，實至確當；乃所謂不涉主義，純爲機會主義，實與干涉無異，要以何者爲得計，而遂行超然行動，不預受任何約束；至超然行動，於英國外交上，雖佔極重要之地位，然只爲謀取均勢之方法之一，及行動超然，不預受任何約束，始可立於國際紛爭之外之上，以調停仲裁者自居。如此，始可左右一切，保持各國勢力之平衡；是故，國際均勢，實乃英國外

交之主要標的，有均勢，方有和平，不然戰爭固不能制止戰爭，歐洲大戰及其後果便爲明證，即所謂和平方法，亦不能使戰爭完全消滅，阿比西尼亞因於國聯和平方法之下而淪亡者；惟均勢可運用一切，左右一切，巴克（Ernest Barker）嘗云「均勢只是一種改換同盟之方法」；惟均勢可保持領導地位，勸恩巴邦（Ernst Kheinbaben）於其趨於歐洲均勢一文中，謂英國所謂均勢，其主旨是說：歐洲各國間如發生爭議，英國得獨享「最後決定之」的最高權；惟均勢可扶弱抑強，維護世界和平，童愛畢（Foyndee）博士以二百餘年英國外交史的推演，證明「英國外交唯均勢，均勢爲保護大多數之自由，而反抗極少數之野心」；惟均勢，始可取得和平，惟和平，方可保全利益，英人之保全利益固以此，世界之欲得和平，亦將有賴於斯。

第三章 英國外交與遠東局勢

一 英國遠東外交之回顧

所謂遠東，其地理上之位置，就赫特生（C. L. Hudson）所云：「新加坡尖

鏡嶼，乃遠東之起點，由普通航線，過此便爲西貢、香港、上海、神戶、直至白令海峽；換言之，所謂遠東，卽亞洲太平洋岸與其內地并隣近諸島嶼；英國通遠東屬地之航路，是由直布羅陀、馬爾泰、亞丁、印度、馬來、新加坡、以至香港。英國與遠東通商，雖然很早，但正式發生關係，則始於一八四二年之南京條約。英國之所以最先與中國發生關係，與其資本主義之發展有連帶關係。英國在十九世紀，資本主義已有迅速的發展，彼時西方殖民地，既已分奪殆盡，而諸歐洲大陸國家，其資本主義，亦復漸漸興起，如此，英國大量商品與過剩資本，非另求一新出路不可，至是地廣人衆，素抱閉關主義之中國，遂被逼開禁；當時，遠東比較重要之國家，惟中國與日本，而從十九世紀末葉到二十世紀，日本經過所謂維新運動，業已逐漸強盛，中國則一直到現在，尙未能盡脫從帝國主義者之纏絆，所以國際糾紛特別多，問題特別重要，以致普通所謂遠東問題，其實實泰半指中國問題而言。英國爲最早打開中國門戶的國家，同時力量亦最大，爲明晰其於遠東之外交起見，特先作簡單回顧。

英國從拿破倫戰爭以來，不僅是歐西海上之霸王，且爲東方航路的控制者，彼於打開遠東門戶之先，於印度早具深厚勢力，一八一九年並獲得新加坡，爲其

葡葡之根據地。所以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雖爲遠東貿易與殖民地之先驅，然實力都乏充實，以致真正以強力打開中國門戶的，還是英國。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乃英國資本主義向外發展，勢力伸張到中國之序幕。當時，英人目的只在取得中國市場，并無領土野心，此可於因結束鴉片戰爭而所訂的幾個條約中見之。因結束鴉片戰爭所訂之條約，爲一八四二年之南京條約，一八四三年之善後事宜條約，以及五口通商章程。此三約所給予英人之權利，最要者，厥爲通商權利，其他不過是用來担保，或方便此權利之行使而已。南京條約第二條，把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開爲通商口岸；第五條將行商制度廢止；換言之，此兩條將以前之限制取消，准許英人於五口岸與一切華人通商。此種通商權的取得，乃爲英人當時主要願望，亦即鴉片戰爭之根本原因。依常理言，通商爲人類生存所必需，此種通商權，任何國家均可要求與享有，中國對其他國亦然，并非英人於中國所享有之特權。一八四三年善後條約第七條，規定通商口岸概准英人自由居住，當地華官應與英國領事相商，將地段與房屋劃出，其租買應照當地通行之價；此不過於通商口岸內，劃出一地與英人居住，亦極尋常，并無絲毫特殊權利，其後演變爲世外桃源之租界，固非中國政府預料所及，亦非英方人士之所

時期。

也許有人要提到香港割讓，涉及領土野心，南京條約第三條，規定將香港割讓與英國，此非領土之圖謀而爲何？其實，英人要香港目的乃以之爲資本主義向中國發展之根據地，所以從英國與遠東發生關係的動機上觀之，英國遠東外交，自始即以獲得經濟利益爲唯一目的。即以以後之天津北京兩約，其重要條款，仍不外爲擴充市場，及謀取通商之便利。

前曾一再論及，均勢主義，爲英國外交上一個主要原則，南京條約締結後，美、法、俄、德、日，均乘機而至，爭奪利益，英國爲資本主義先進國，固早已採用自由貿易，同時，市場競爭，彼復毫不介意，況且中國并非其屬國，各國前來通商，英人自無由反對，不過英國以其在華利益雄厚，自亦不能受他人之威脅，於是任外交上便處處着重於均勢之施行。法國於一八八三年佔領台灣海峽中之澎湖羣島，於一八八五年亡我屬國安南，前者之佔領，使英國對香港上海間之交通有隨時中斷之虞；後者之滅亡，使英國對印度及中國市場，感受重大威脅；因此，恐有以對之，遂於一八八六年便併吞緬甸。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之後，日本除獲得中國對朝鮮獨立承認之外，并佔有台灣澎湖及遼東半島，俄德法三國固于

中國。日本以收進遼東，遂請以索取贖金之結案俄租旅順，德租膠州，法租廣州，業經各國承認。計，遂亦租借威海衛與九龍。其餘各處地權租借而為勢力範圍之劃分，皆據為北滿，日本為福建，德國為山東，法國為雲南，各佔地盤。不許他人沾染，為維持均勢，英國亦即劃分長江流域，為其勢力範圍。及至美一日提倡門戶開放，英國首先贊同；如此英國遠東外交，自南京條約直至九一八前，其目的完全一致，即保護其經濟利益，維持其素所主張之均勢主義。

於以上所云之單獨行動外，為保護利益維持均勢，英國尚不時尋求與國，以期主張之得實現，目的之得完達；十九世紀末葉，俄國國勢日盛，且處處顯有南侵之野心，英人思有以制之，遂有一九〇二年之英日同盟；及至日俄戰後，俄國敗北，英方泰然，可是德國繼以對遠東猛進，多足危害英人利益，所以在第二次英日同盟繼續簽訂之時，便將原來之對俄目標，一改而為對德；大戰以後，德國在遠東一切權益盡落日人之手，同時日本更乘機侵略中國不已，日本國勢日盛一日，英國太平洋之殖民地，亦多方感受威脅，英國遂改變政策，英日同盟斷絕，而以九國公約與四強公約代之。總之，英國於遠東外交折衝，兢兢焉深恐均勢之喪失，而以其處處力行，致九一八前，遠東迄未見絕大混亂。

二 一九一八以來英國外交錯誤之背景

一九一八發生之原因繁夥，所謂錯誤背景，僅就其致使事態變本加厲，日趨瘋狂者而言，英美對立，英蘇疑懼，乃其中之尤者，特略加討論。

英美對立，前曾有所論及，此種對立，完全以經濟商業爲出發點，從而影響政治外交，英國欠美國四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戰債，依常軌，非至一九八四年不能償清，英國遭受美國經濟壓迫極大，此乃人盡知之；而美國復更進一步，不獨不願將歐洲國家戰債總額減少，且於一九二二年九月通過福特納麥坎伯爾稅條款，增加稅率，使歐洲貨物不得輸入美國，以抵償戰債，如此，各國惟有運金赴美，償還債款，因之，歐洲存金日少，美國積金愈多，美國嗣復利用此項積金，收購股票，發行債券，自此，剝削愈甚，英鎊日下，美元日上，金融之領袖地位，不得不由倫敦而轉於紐約。

至商業方面，無論在工業品輸出的領土上，或資本輸出的領土上，或各種工業原料生產的領域上，英美雙方在在均表現着非常激烈的衝突，而南美、中美、中國，及其他英國殖民地自始類，亦都成爲彼等衝突之場所。在太平洋沿岸的自

沿領，特別是加拿大與澳大利，美國獲得勝利最大；在一九二九年之加拿大輸出中，美國佔百分之六十八，英國僅佔百分之十六點八；在澳大利，英國輸入減少至百分四十三點四，美國則增至百分之二十四點六；在新西蘭，美國輸入於一九一三年爲百分之十，至一九二九年即增至百分之十九。在東太平洋沿岸，南美智利、祕魯、厄瓜多爾、哥倫比亞、英美兩國除利用土著封建分子與資產階級彼此作強烈鬥爭，互相削弱外，更有激烈的經濟衝突之存在；一九二六年，在此等國家之輸入中，美國的比例是百分之三二點六，百分之四六點二，百分之四二點四，百分之四六點六，英國則爲百分之二七點二，百分之二五點六，百分之二二點六，百分之十六點二。即巴拉圭與玻利維亞之戰爭，實亦英美於南美衝突之具體表現。在中美墨西哥、巴拿馬、哥斯德利哥等處，美國優越之勢更甚，即在英國殖民地印度、錫蘭、海峽殖民地、馬來羣島、波羅洲、（此處）處，英美商戰亦極強烈。在名義上爲荷蘭殖民地，而實際則在英國支配下之印度尼西亞等地，以及地廣人衆的中國，英美衝突亦均顯著。

英國既處處發現與美國衝突，且自覺力有不及，致不得不向他處努力，以圖與美國對抗，因而英法、英日間遂有形成緊密體系之傾向；英美消極的不合作，

已予日人以可乘之際，何況英人尙蓄意支持力助日人，取得優勢，以冀增加美國於太平洋上之困難乎？

歐戰結束之初，蘇聯外交政策，可算完全側重於助成世界革命，以俄國爲根據地，開始對全世界資本制度下總攻擊；因之，到處宣傳共產主義，爲引起東方各民族之同情計，復宣佈廢止一九〇七年平分波斯勢力範圍之英俄協商，放棄帝俄從中國所攫取的各種特殊權利，廢止在土耳其所享有之一切治外法權與財政權；并懲慮阿富汗抵抗英國強權，於巴庫且召集東方民族大會；因此種種，英國寇宋外相固會對俄國一再責難，而包爾溫復快刀亂麻，乾脆否決一九二四年八月英蘇關於債務清算及商業信用借款之條約；奧斯丁張伯倫則竭力促成西歐羅加洛之簽訂，莫斯科認此爲英國對付蘇俄之陰謀，遂力求對策，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致有俄土友好與中立條約之簽訂，四越月，復有俄德同樣條約之締結於柏林，其後與立陶瓦、阿富汗、亦有繼續簽訂。一九二六年英國大罷工，俄國工會復加資助，致英俄關係愈趨緊張，一九二七年二月張伯倫警告莫斯科，除非蘇俄在歐亞兩洲停止反英宣傳與活動，兩國外交關係將再度斷絕；嗣後蘇俄在倫敦所設之貿易公司 Anglo-Soviet。突被英警搜查，唐寧街復宣稱英政府已發現俄人從事非法活動之充

分證據，足以與之斷絕外交關係，國會亦如此決議。

英蘇間之所以如此不和，要歸受經濟政治之潛伏勢力所驅使，蘇俄一經成立，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即形分裂，社會主義出而與之對抗，其後蘇俄對內：則節衣縮食，同心協力，以四年時間，完成五年之經濟計劃，經濟發展，未受世界恐慌任何影響；對外：則積極傾銷，增加資本主義國家之經濟恐慌，因此，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懷恨益深，處處思有以制之，英人曾有「日本友誼不可忽視，因其間接保護大不列顛之利益，以反對共產黨之傳播」。如此，對日人於遠東行動，才方加以支持。

三 西門外交之後果

英人多方支持日本，期用以牽制美蘇，日人有見及此，遂趁火打劫，發動九一八，舉行日加，九一八發生之初，史汀生即向西門建議：「我們兩個政府聯合願意追隨我們的簽字國家，根據該約第七款而動作，發表聯合宣言，指述九國公約精神所受日本行爲之打擊，並明白表示英美兩國在簽約者的地位，不想默認自東京傳出的放棄該約的任何建議」；西門一則對美國建議，置若罔聞，一則於日

內瓦竭力延緩國聯行動，某次中國代表以英法美三國調解牒文，并未奏結束事變之效，遂申請行政院採取行動，而西門則一味推託，竭盡強辭之能事，大意說：「雖則三國善意調停的建議，未能立即產生一協定，但他相信也不是全然徒勞，因爲在上海建議中之一項——設立中立區——仍然在進行談判中，他特別提出這些談判，有一非國聯會員美國之參加，因之請求行政院少安毋躁；而法代表彭古，則代表行政院表示同意，轉而勸告中國代表暫時忍耐。不僅此也，在另一次宴會席上，西門竟公然宣稱：「爲什麼別人，尤其是英國要不直日本目前之行動？英國豈非如此建立起來？唯一差別，是日本行之於目前，其他國家則目前業已罷手」。如此言論，扭轉歷史，雖日本發言人自身，當亦不能再另作善辯。於此情況之下，美國既孤聲難鳴，蘇聯復意存觀望，是日人之橫行無忌，自在意中。

英政府其所以不與其他遠東有關各國合作，竭力支持日本者前已言及，要爲牽制美俄，同時誠如其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美國政府致中日覺書後所宣稱：「英國政府之政策在擁護滿洲境內九國公約所保障之門戶開放政策原則。關於此點，日政府既已屢次表示加以遵守，故英政府認爲無致送同樣書之必要」；英政府滿以爲如此支持日本，不與其他有關各國合作，可收牽制美俄及保障自身利益

兩得之功。後復派遺員「聯絡英日荷友誼使命」之實業調查團赴滬，即李新羅斯亦曾一再勾留東京，力圖與日方開始談判；比京九國公約會議時，英團倡導調解，規避制裁；卡爾大使赴任之初，流連滬滬，遲遲不來內地，其財賦頗同赫爾巴奇復運往東京；凡此種種，皆足顯示英人之用心，孰知日人雖一再保證遵守條約，保持中國門戶開放；不侵害第三國權益，對中國無領土野心，并屢屢宣稱：「吾人華北，大不列顛華南華中」，然事實則完全相反，不特滿洲華北，第三國權益悉被摧毀殆盡，且第三國房屋、商船、軍艦、武官、大使等等均先後成爲日軍轟炸目標；及至南京、廣州、武漢、相繼棄守以後，整個沿海、沿江、華中、華南，俱在日人掌握之中；茲復進據海南島，企圖襲擾香港，切斷英帝國交通，減少新加坡功能，威脅澳大利，新西蘭；不僅此也，後更佔領斯巴特萊，蓄意霸占太平洋，將他國利益掃蕩盡，英致認爲「日本此舉，足以使遠東局面更趨複雜混亂」；實質，豈只遠東局面因之更趨複雜混亂而已，前據華盛頓電訊，萊薩員馬亞斯，已獲得確實證據，足以證明日本已在加羅林羣島設立空軍根據地，德日兩國飛機曾從加羅林起飛，飛過關島上空，日人且有將太平洋上德舊屬島嶼運轉圖之說，日人貪婪無厭，苟無更大棟求，決未必如赫爾說慷慨，然日人與西歐

極難國家之讀極勾結，以求東西呼應，自不難於此等消息中，窺見一斑。

此次天津事件，英倫輿情鼎沸，僉認「英國已較歷史上任何大國採取更大之容忍態度」，張伯倫首相亦目之爲「不能令人容忍之侮辱事件」，名政論家巴特烈則稱：「甚至疏遠如美國印度及紐西蘭等國家，本人亦曾問悉各該國權威方面所發出警告，謂：若在遠東方面恢復採取姑息政策，則必造成有害之結果，然而此次吾人實不敢確定英國并未計劃採取此姑息政策，……」而戈培爾於六月二十五日在哥倫尼公開演說，大肆諷刺曰：「不觀於天津英僑被日軍刺去衣服乎？至今未見英國有何動作，於此足見英國之無能矣」。東京及其他各處，不斷舉行反英示威運動，聲稱：「英國須變更政策，適應遠東方面之局勢，日本則已決定依照人民意向發展東亞」；是即明令英人放棄遠東，退出遠東，同時東京英大使館被暴徒包圍，而駐華大使卡爾爵士之安全，則在在遭受威脅，如此，利益被消除，國際威信受損害，英帝有史以來，其臣民從未遭受若是之重大侮辱，一切一切，悉係西門外交之後果，西門英明，豈亦曾預料及之！！

四 英國遠東政策之前瞻

英國於遠東有悠久歷史，重大利益，外人在中國之投資與航運，以英國爲第一，獨佔全數之半；就一九三一年之數目，東三省除外，總數共爲四九六六〇〇〇〇鎊，英國爲二四四〇〇〇〇〇鎊，佔全數百分之四十九，日本爲一二〇〇〇〇〇〇鎊，佔全數百分之廿四；美爲四一〇〇〇〇〇鎊，佔全數百分之八；如此重大利益，英人自難草率犧牲，況於此重大的，物質的利益之外，尙有英人所最重視之國家尊譽（National honour）存在於其間；今者，此項尊譽，不特遭受威脅，且被侮辱蹂躪，苟英人有意，早已構成宣戰理由；勞合喬治前於哥納瓦爾演說，涉及天津事件時，曾曰：「英國已成爲歐美之笑談資料，英國威望之沒落，有如國聯威望之江河日下」，誠慨乎其言。

英國威望竟長此江河日下乎？是又不然，一切要以英人此後之行動爲依據，此種行動，亦即英國遠東政策之未來，欲明究竟，吾人須從以下三點着手討論：（一）日人如何興起，以至橫霸，是否係受英人之支持所致？（二）日人橫行與英國利益能否兩立？（三）有關各國之不能合作，確否給日人以個別擊破之機會？此三者決定之後，英國此後之遠東政策，究將如何，將不待解答而自明顯。日本之所以興起，論者每謂其基於所謂明治維新，「明治維新具有傳習的，

革命的，變重特質，中國過去所謂改革，如洪楊之亂，完全與舊有傳習無關，而是一種急進的變亂，致未能收明治維新之成效」。中日近世紀以來，國勢懸殊，內政原因固大，但外交方面所受之影響，其重要決不在內政之下；從此點出發，日本之所以興，之所以有今日，確完全是一九〇二年英日同盟之所賜；於此同盟之先，中國雖曾一再受挫於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以及甲午之役，而日本則逐漸抬頭，然苟無英日同盟，無英人之於政治、外交、精神等方面之鼓勵與援助，日人決不能獲得一九〇四——五年之勝利，從而獲簽麥斯條約之簽訂；從此條約，日人將俄勢驅逐於滿洲之外，自己則積極進侵，確立插足大陸之基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日人復乘火打劫，一面於中國竭力擴張勢力，一面於太平洋攫取德國舊屬島嶼；其後於華盛頓會議，日人野心雖曾稍受鈍挫；然值世界不景氣象發生之際，日人立即變本加厲，致有「九一八」「七七」「八一三」等事變之發生，橫行無忌，中國弱質，無此，日人國勢之長成，淵源實出於英日同盟，英人之培植。至長成之後，其目的則在略奪之初，英人如其政論家杜特所云，復「曾竭力支持日本侵略，其所以如此，不僅想拉攏日本去共同反美，同時還想把日本當作遠東鎮壓中國民族運動乃至進攻蘇聯的重要勢力」，如此，日人

之得意忘形，勢無忌憚，自屬必然。

日本勃興，乃至橫行，英國利益遭受莫大損害，前曾一再論及，英國在中國之投資、航運、商業等等，在在均居於最重要之地位，今又如何，日人暴行愈甚，英人利益所受之損害，所遭之排擠愈大，他處現無從數字，只就東三省而言，在一九三〇年，即在日本征服之前一年，東三省從日本輸入，佔輸入總數百分之三十六，到一九三六年，從日本輸入，則達百分之七十二；換言之，在六年盤據之後，確實一倍；一九三〇年，東三省購買外貨總值四六二〇〇〇〇〇元，一九三六年爲六九一〇〇〇〇〇元，同時期內，其購買日貨，從一六六〇〇〇〇〇元，增至五〇七〇〇〇〇〇元，如此，全部收入，增加二二九〇〇〇〇〇元，而從日本輸入者，却增加三四〇〇〇〇〇元，換言之，日本從東三省的急劇發展中，除吸收了全部利益之外，并略奪其餘剩之百分之五十，此百分之五十，即從排擠其他國家之商業利益而來，此爲二年前之事實，近更愈演愈厲，且從東三省而推行至於華北，甚至華南。近衛曾說：「在工業方面，政府的根本原則，是要在一個包括日滿支三國的廣泛計劃之下，增進我國的生產力，努力供給國防需要的物資，振興一切主要工業，以及擴展我們的出口貿易」。廣田則

謂：「從地理上講，日本正考慮締結一個適用於中國全部的經濟協定，我深知關於開發自然資源、交通、以及貿易的各種協定也都將締結」。此即所謂「東亞新秩序」、「東亞協同體」、「日滿支提携」等等狂妄口號之註腳，置整個中國於其統制、蹂躪之下，排除一切歐美利益，天津封鎖，到處反英，是日人之勃興狂暴，與歐美權益絕無兩立之可能，英國更何得幸免？！

前曾言及，九一八事變後，英國遠東政策錯誤之淵源，爲英美對立，英蘇不和，致日人乘機進襲，英人圖以「英禍牽制於俄，俄禍牽制於日」，實與日人「反共」，完全是一種烟幕，要在從事侵華，驅逐英美等利益於遠東之外，廣田前曾明白宣稱：「蘇聯如能了解日人之真正意志，則雙方之關係自可改善」，所謂「日人之真正意志」，乃言其實質并非反蘇而已，如此，英人欲以日本牽制蘇聯，不特不能達其目的，且反而受日人之愚辱利用，而中其離間與各個擊破之奸計。至日美關係，田中曾云：「欲以鐵血主義保持東三省，則第三者美利堅，必受中國以夷制夷的煽動，來制我，此時我對美角逐，乃義不容辭」。日美之間，以正義與利益，勢多不能融洽之處，田中所言，自另有含意，英國支持日本，以增加美國之困難，驕視之，英人未始非計之得，然究其實質，完全中日人之陰

謀，濱石氏固曾一再主張：「日本當與美國成立協定，進攻蘇聯」；石九庵亦復堅持「日本非對英宣戰不可」；如此，中、英、美、蘇等均係日人之敵，固爲日人之侵略目標，祇日人力量薄弱，不能同時進攻，惟有一方面利用以夷制夷，一方面則出力個別擊破，今日聯甲攻乙，明日聯乙對甲，後日則聯丙以抗甲乙，蘇期甲乙丙三者俱喪，而彼獨稱王；準是，英國未圖與美蘇等國聯合，反而支持日本，以謀牽制美蘇，實中日人之奸；以致星星之火未滅，今則延及己身，失計之甚，孰過乎此。

和平不可分割，且納萊教授曾云：「沒有人會否認遠東與歐洲的密切關係，即在歐戰以前，亞洲事件，常於西方發生重大影響。例如一九〇七年英俄對於東亞的協定，實爲兩國在歐洲成立同盟之先聲，又如滿洲事變，實爲對於歐戰以後德俄建立的集體安全制度第一次有力的破壞」。英國於遠東，態度如此，論者每謂係受他處政策之影響，但他處，如歐洲之混亂，又何嘗非因於遠東業已採取此種態度之所致？兩者互爲因果，不可分離，觀乎西歐混亂，遠東則乘火打劫，遠東積極，西歐則混水摸魚，益證彼極權國家之相互呼應，姑毋論遠東之暴行，先於西歐之混亂也。如此，英國欲澄清歐局，退一步說，縱不於遠東先行設法，

制止狂暴，至少亦非同時設法不可，否則，必多徒勞。最近英法蘇三者，莫斯科談判，其所以遲遲雖有結果，似可於此處加以尋求。英國於遠東支持日本，是助桀為虐，欲於他處澄清，實非可能，反之，欲澄清他處，必先澄清遠東，澄清遠東，則須制裁暴日；制裁暴日，惟有與有關各國合作，英國未來之遠東政策，惟有賴此正軌，方能保全利益，恢復威望，謀獲和平。

結 論

西門遠東政策，為一種錯誤，一種病態，與英國傳習外交多不容合，致造成數年來遠東以致全世界之絕大混亂；西門之所以如此，原與他處政策有關，英美對立，英蘇不和，因而支持日本，滿期用以牽制美蘇，唐甯街然後為以左右一切，從而安定世界；孰知事有不然，美國雖因而孤掌難鳴，蘇聯或以之採取觀望，但日人暴行日甚一日，非特唐甯街不能左右一切，世界且因之日趨混亂，極端國家相互勾結，民治制度遭受嚴重打擊如此，一方面西門遠東政策，深受他處外交之影響所致，而遠東不安，復為歐洲混亂預下種子，循環連帶，益證和平之不可分割；另一方面歐洲近數年來之混亂，國際條約、法規、秩序等等之悉遭破

壤，始作俑者。實露耳人，他國因難效尤，全世界有識之士，類多如此定論；準是，英國外交固足影響遠東和平，其遠東政策，實亦影響他處外交，而爲整個世界和平之所維繫。

今後世界和平之恢復，端賴英國外交之入於常軌，英國外交能否入於常軌，厥視其於遠東（一）病態心理之能否加以振刷，（二）傳習政策之能否再行堅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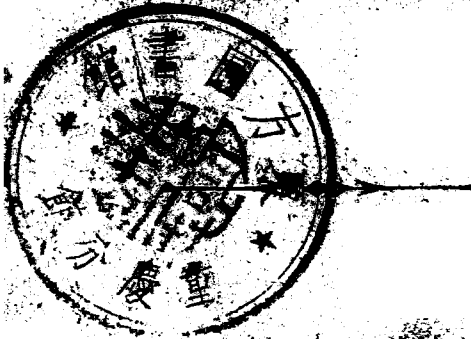
「日本的友誼不可忽視，因爲日本間接的保護大不列顛的利益，以反對共產主義的傳播」；此爲英國資產階級普遍的心理，近仍以「中日戰事結束之後，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何者將佔上風」爲慮；此完全中敵人惡意宣傳之毒，日人究如何保護英國利益，前曾一再論及，且事實勝於雄辯，請以九一八以來之事實爲證，無庸辭費。至就防止共產黨之傳播而言，亦復無稽，中國決不會被任何國滅亡，同時亦決不想滅亡任何國，此爲解決一切遠東糾紛之前提，以日本經濟組織，政治機構之脆弱而言，戰事牽延，彼縱不自趨滅亡，亦必先遭受共產黨之變亂，其自身且有賴乎他國之助，尙何防止他國之可言。

童愛畢博士，曾言「英國外交政策唯爲均勢，均勢爲保護大多數之自由，反

抗極少數之野心」。英國遠東政策，以商業爲重，維護商業，維護和平，保持和平，厥爲均勢，前亦曾詳細論及；至所謂均勢，就最近英倫權威之解釋，非僅指「勢力」(Strength)，且亦指「趨勢」(Disposition)，今者，日本之大陸與南進兩政策同時并進，「勢力」擴張，因破壞遠東均勢；而其蓄意侵略，破壞和平，已成「行動」「事實」，非僅「趨勢」而已，自更與和平均勢不容。如此，恢復均勢，亦即恢復和平，欲恢復均勢，則須日本之「勢力」與「趨勢」均有所改變，欲其如此，則須有關各國之一致行動，「祇有中。勝利，才是遠東和平與太平洋安全之可靠保障」；前爲紀念中日戰爭兩週年，英倫各報亦僉稱：「中國戰勝，不僅中國蒙受其利，全部之文明世界，均將受其惠也」。

●畏日，因而親日之病態心理，一日不除，英國自難有滿意之措置，而尊重中國主權，聯絡和平勢力制止侵略行動，尤爲英國政策應取的步驟。這是對於英國本身利益與遠東和平均有裨益的。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

324

12

重慶東方圖書館

5-78

124964

本書登記證字第四八五號

版 權 所 有			
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初版 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九版	總經售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二十二號 拔提書店 重慶武庫街八十三號	印行者 獨立出版社 正中書局服務部 重慶中一路二八〇號	編著者 孫 煦 存 英國外交與遠東和平
實 價 一 角		(238)	